

基督教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张佳生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多种历史因素的产物,文章从社会伦理学角度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与基督教伦理息息相关。基督教伦理有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合理内核,基督教伦理在这里包括救助伦理、婚姻伦理和经济伦理。这三者在西方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保证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它有力地支持着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

[关键词] 基督教伦理; 西方世界的兴起; 支持作用

[中图分类号] B8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1-0021-03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对于西方世界兴起的动因,目前学术界主要受到三种思想的影响。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于西方经济制度的合理化,即一些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在西欧的发展,如保险公司、专利法和股份公司等。^[1]二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上世纪30年代在其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的观点。默顿比较研究了17世纪英国科学家与他们信仰之间的关系,认为此时英国清教徒取得的科学成就较保守的天主教徒多。因此英国清教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2]但在世界学术界影响最广泛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新教经济伦理在于个人积累,他们不断的财富积累是因为新教的天职观。财富积累和创造的动力就产生了资本主义。^[3]受上述理性主义认识观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伦理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有着历史的阻碍作用。从经济学、科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角度来解释历史会使历史变得容易理解,但它们却使历史的面貌更加苍白。但当我们从历史修正主义视角来看历史时,便发现基督教伦理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方世界的兴起离不开传统的基督教,基督教伦理中有利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合理内核。这里的基督教伦理包括救助伦理、婚姻伦理和经济伦理。笔者认为基督教的救助伦理、婚姻伦理与经济伦理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下面将一一论之。

斯坦地区的人们为摆脱罗马统治者经济压榨和人生苦难的一种宗教,其核心目的是摆脱受压榨时的苦难心境,等待某天的解放。在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安慰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是爱,一种无私的关怀他人的积极行动。在《新约·路加福音》里,耶稣叫门徒卖掉财物和给人施舍,因为灵魂在天上,并称,“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4]教会率先垂范,以自己的地产、信徒的捐献物和其他财富去救济穷困者,另外,他们还建立收容所和慈善院。社会人士和工匠行会在基督教“善功”思想的推动下也参与其中。在1216—1350年的100多年间,英国建有700多所慈善院。^[5]此时基督徒也在社会进行积极的救助宣传,如12世纪的福音运动者宣称,“基督在哪儿?只在基督的穷人中间。”^[6]这就是说,要成为上帝之子,就得救济和帮助穷人。而教士所进行的救助布道包括七大项:给饥饿者以食,给口渴者以饮,给无居者以宿,给体裸者以衣,给病患者以安慰,给狱犯以探访和给死亡者以安葬。^[7]这些规定就构成了基督教的救助伦理思想。

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主要肇始于英国,16—17世纪是英国由落后的封建国家过渡为欧洲强国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社会贫富分化。但英国摆脱了17世纪欧洲普遍的社会危机,进入到工业革命的前夜。其原因在于英国社会的积极救助和政府《济贫法》的颁布与不断的完善。此时英国用于社会救助的帮助费在100多年间翻了10多倍,有人甚至称其为“慈善革命”。^[8]在16世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里,他们也主张帮助穷人。英国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代表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乌托邦》里除声讨自私的农场主制造了“羊吃人”的社会灾难外,他还建议人们帮助穷人,如要求抽济贫税和给他们提供劳动等。^[9]他的这些思想被英国政府所采纳并成为法律,因为在16世纪前期英国便开始颁布

基督教兴起于小亚细亚,它是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巴勒

[收稿日期] 2007-10-12

[作者简介] 张佳生(1970-),男,四川南江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

《济贫法》,征收济贫税。而这些救助行动主要来自于上述基督教的救助伦理观。

在 16—17 世纪的济贫行动里,人们当然不完全是世俗的利己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动机。虽然经过了宗教改革运动,但教会力量还一直影响着社会的思潮和行动。当时教士还保持着原有的宗教职责,因为教会规定教士须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救济穷人。他们还向富有人士进行劝告以进行社会慈善捐助。世俗人士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如在 1598 年,英国斯塔福特郡的地方名流托马斯·沃尔斯利就对治安法官讲,济贫税几乎拿走了他所有用于施舍的东西,并威胁道,“没有施舍的人是得不到拯救的,我要是来世不幸,我会让你们承担罪责的。”^[10]虽说 16—17 世纪英国清教思想受到不少人士的欢迎,但清教的济贫观还是遵从基督教的社会救助传统,如清教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珀尔斯就呼吁道,“上帝的意愿是穷人有权分享每个人物资的一部分,故此,如果他们没流浪、乞讨和呼喊就不被救济,那是上帝的耻辱。”^[11]最后,随着 15 世纪欧洲印刷革命的发生,英文《圣经》在英国普遍地被阅读。《圣经》中鼓励捐助的箴言是极大地鼓动着不少人进行社会救助。

英国政府和有识之士遵守基督教救助伦理,使穷困者受到救助,社会矛盾因此得以缓和。应该说,如果没有人们彼此的帮助,16—17 世纪的英国就不能渡过“普遍的 17 世纪危机”,就会如世界其它地区一样陷入混乱,如中国明末有李自成农民起义。这样英国就不可能获得经济复兴的社会条件,西方世界的兴起也就付诸阙如。

二

人类在原始社会阶段就开始了婚姻生活的文明化,从群婚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巩固一夫一妻制,反对不道德性行为在西方是早有传统的。首先,在基督教世界里,婚姻是很慎重的事,因为结婚和独身被看作是两种不同的侍奉上帝的方式。无论是教会早期的克莱门大主教,还是公元 4 世纪的圣哲罗姆,他们对独身和婚姻的态度大体一致。他们认为婚姻是上帝赐予的,如需结婚生育和防恶,婚姻的目的就是正确的。而独身的禁欲若是对上帝的爱,就是正确的。反之,结婚和独身都不应该。^[12]到 12 世纪时,基督教会抬高婚姻的地位,把它列为七圣事之一。即在教会的思想里,婚姻本身被赋予了神圣性。这里,新婚燕尔需穿着洁白的婚纱步入教堂,进行规范的婚姻仪式,实际上是接受教父的证婚。洁白代表着纯洁,即人们出于爱的需要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以纯洁的爱情结合在一起。

其次,在婚姻生活中,不合理的行为要受到基督教教义的谴责。首先,婚前性行为是不允许的。在《圣经》的《申命记》中,女子婚后若没有婚前贞洁的凭据,就会带到她的亲父门口,让本城的人用石头将其打死。^[13]这条叙述以后成为欧洲人婚姻贞洁观的根据。私生子也得不到教会的洗礼。在《出埃及记》中,婚外性行为更是受到诅咒。他们提出“不可奸淫”,“也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14]在《利未记》中还禁止与周围人的妻子发生关系,“不可与邻居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与邻居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必致死”。^[15]基督教的主

要教父圣哲罗姆就此说道,童贞是小麦,结婚是大麦,通奸是牛粪。正如人不能吃牛粪,当然人就不能通奸。^[16]这些婚姻伦理就是限制不合法的婚姻生活,其目的是巩固一夫一妻制,维持社会的稳定。

再次,在基督教的世界里,解除婚姻是受到限制的。耶稣曾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17]教会规定有效的婚姻具有终生的束缚力,要解除婚姻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无生育能力;通奸;一方死亡;存在禁婚范围内的亲属关系。^[18]1528 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想得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而要求与王后凯瑟琳离婚就为罗马教皇所反对,因为王后生得一个公主都铎·玛丽。普通百姓的受限制也足见一斑。对解除婚姻的限制在于基督教会想以此来维持稳定的家庭从而保证有序的社会。因为夫妻间要离婚的理由太多了,其目的都是自私的情欲。

最后,虽然世俗的法律对寡妇的再婚给予了认可,但教会对于寡妇再嫁是有限制的。圣哲罗姆、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从圣经中引申出寡妇守贞的理论,并推而广之。圣保罗因害怕年轻寡妇遏制不了自己的情欲主张她们可以再嫁,但年龄大的寡妇就不要再嫁了。^[19]虽然中世纪有部分女性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再嫁,但 16、17 世纪欧洲的寡妇很少再嫁,且比率呈下降趋势,如在英国的阿宾顿地区,寡妇再嫁的比率从 16 世纪的二分之一降到 17 世纪后期的四分之一。^[20]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家产的管理和继承纠纷,另一方面是不少妇女遵从传统婚姻伦理,不想再嫁。

教会对婚姻的上述规定构成了基督教的婚姻伦理思想,其目的是加强一夫一妻制。进入 15、16 世纪后,对英国富有人家来说,一夫一妻制能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转。对普通下层人而言,一夫一妻制则保证了更多人的婚姻可能性,少了不合理的男女关系。在家庭的婚姻稳定和幸福受保障后,人们也就生活在积极的创业中。而许多人为得到自己的意中人,就必须有一定的财富。因此不少下层青年的结婚年龄大约在 27、28 岁左右。^[21]虽然 16、17 世纪的一些思想家鼓励真正爱情式的结婚,主张没有精神结合的婚姻者可以离婚。但他们的思想并未受到广泛地欢迎,因为不少人是因为爱情而结合在一起的。寡妇再嫁的减少则保持着社会的稳定,特别是一些富有人家的寡妇不再嫁能保持家庭财产不被分割,他们的家庭产业因而能继续保持,家庭事业的发展也就比较顺利。资本主义的生产也就能建立在高资本的起点上。

三

人们一般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于宗教改革后人们摆脱了基督教经济伦理的限制,即追求经济利益被认为是合法的。因为以前教会是限制商业的,而这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障碍。但对基督教经济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之关系我们必须做谨慎的分析。

首先来看财富的积聚。在基督教的教义里,财富的积聚是受限制的,他们认为对钱财的积聚是罪恶,只有疏财才可得到拯救。如《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就声称,财主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22]在这里不是说基督教不主张创

造财富,而是有财就得行义。比如教会本身就租放地产、开办钱庄和经营其他盈利行当。但教会除以这些财富维持教会的正常运转外,它们还被广泛地用于公益事业,如对教区桥梁修建的捐助、对孤苦者的照顾和对死后穷人的安葬。这样基督教就把逐利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了起来,从而避免人们见利忘义和为富不仁。

其次,我们一般认为教会对借贷利息的限制是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基督教教会法却开列出现实十二种情况的人可收取高利贷利息的例外,从而保障了社会的正常借贷。^[21]教会允许进行高利贷的人大多也有特定的原因。对高利贷的限制,是基于基督教对过多剥削的限制和减少社会经济投机的机会。这实际上鼓励人们进行无息借贷。因此限制高利贷可保障借贷穷人的利益。同时,其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诚实地劳动,因为一些人会以此寄生而获利的。可以说,这里教会不是故意对经济发展进行阻碍,而教会自身所进行的高利贷是尽力避免对穷困者欺压和落井下石。

最后,基督教会也是限制商业贸易的。因为教会认为,一些人在商业交易中会故意抬高物价和实行欺骗,而这会使得不少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教会并不害怕一部分人经商富裕起来,因为教会自身也在从事商业贸易。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商业上取消了限制,但这一限制在中世纪的欧洲早已得到了松动。正是这种松动才出现中世纪晚期欧洲商品经济的活跃,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即便如此,对教会来说,认可逐利的目的是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积累,而是为社会的稳定和幸福提供保障。这实际上也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走势。

在16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前夜,英国人还是以传统经济伦理进行社会稳定的维持。如英国的一位绅士1548年在平民院向缙绅们呼吁道,“要知道你们的职责是分配,而不是聚财成堆。上帝并不让你们算计他的土地,而是在他的这个世界的家里充当监护人,去巡查你贫穷的仆人缺乏他们的必需品。”^[24]就整个16、17世纪的英国而言,人们的社会心理还是反对财富的剥夺和侵占。一些地主临死还要求他们的子女不要见利忘义,驱赶租种他土地上的农民。^[25]在近代早期,许多村庄的人们也并未从借贷中收取利息,而基本上是无息的,从而使许多家庭渡过了难关。这里除了乡邻和社区的互借义务外,不少人还受制于教会对高利贷行为谴责的意识约束。由于中世纪教会对商业的鄙弃,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高的。为树立自身的形象和疏财救贫,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人还不惜向慈善机构捐助。美国学者W·K·乔丹曾根据16、17世纪英国东南部十郡市遗嘱的统计得出英国商人(包括大商人和小商人)的慈善捐助占整个社会捐助60%以上的结论。^[26]可以说,没有这些商人的捐助,许多穷人也会如中国等古代社会统治末期卖儿卖女,抛妻别子,西方世界的兴起也将遥遥无期。

稳定与和谐是社会进步的保证,基督教伦理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中正发挥着这一支持作用。这里,基督教救助伦

理使英国渡过了17世纪的普遍危机,婚姻伦理维持着人们财富的积累和创业的精神,经济伦理则保障着正当的获利和经济公正。基督教伦理本身是一种文化,它扎根于人们的心理,因此对社会的发展是一种文化支持。由上可以说,尊重和发扬传统的良好社会伦理,社会进步和有效发展就更容易实现。

[参考文献]

- [1]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0.
- [2] 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7-158.
- [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93.38.
- [4] [17][22] 圣经·新约[Z].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85.24.24.
- [5] Beier, A. L. 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M].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1983. 3.
- [6] Wood, Diana. Medieval Economic Though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4.
- [7] Deanesly, Margaret. A History of the Medieval Church, 590-1500[M]. London: Methuen, 1983. 197.
- [8] [26] Jordan, W. K. Philanthropy in England 1480-1660[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4. 240. 379.
- [9]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1-27.
- [10] 向荣.论16、17世纪英国理性的贫穷观[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70.
- [11] Todd, Margo. Christian Humanism and Puritan Social Ord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0.
- [12] Clark, Elizabeth and Richardson, Herbert, eds. Women and Religion: Resourcebook[Z]. New York, 1977. 41-60.
- [13] [14][15] 圣经·旧约[Z].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187.72.111-113.
- [16] 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86.
- [18] 宋佳红.论近代早期基督教婚姻观念的变化[J].历史教学问题,2004,(1):64.
- [19] [20] 林中泽.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寡妇状况探析[J].学术研究,2004,(9):81.82.
- [21] Wrigley, E. A. and Schofield, R. S.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24.
- [23] 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J].世界历史,2001,(1):55.

(下转第64页)

[参考文献]

- [1] 刘希娟. 渎职侵权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EB/ol]. 阳光网 <http://www.hzmdyg.gov.cn/show.asp?id=44>.
- [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1020. 1260.
- [4] 文盛堂. 反职务犯罪论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5] 李晓广. “如何走出治权监督缺失的困境”[J]. 理论界, 2007, (1).
- [6] 方彦. 构建权力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06, (4).
- [7] 杨凯. 渎职罪立法缺陷与完善[J]. 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3).
- [8] 刘鹏, 丁科佳. 渎职罪的主体研究及立法对策[J]. 理论观察, 2004, (4).
- [9] 苏云, 陈先林. 渎职罪问题辨析[J].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2005, (2).
- [10] 卿尚兵周瑾. 职务犯罪缓刑过多应当引起关注[EB/ol]. 正义网 2007-03-12 <http://www.jsxinbei.jcy.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74>.

The New Study of the Contributing Factor of the Dereliction of Duty— and the Absence of the Holy Sense and its rebuilding

ZHOU Lu-ju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dereliction of duty is a malignant tumor of harming our country and people. It's also the enemy of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The preconditions of getting rid of it are to study the malignant tumor itself and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its punishment. The essay puts forward some new idea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the puzzle and tendency of punishing the dereliction of duty. The most distinctive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ng factor is the absence of holy sens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studies the reasons why the holy sense is absent. It thinks the rebuilding of holy sense is significant for promoting our people's quality and accomplishing long-term peace.

Key words: the dereliction of duty; characteristic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holy sense; puzzle; tendency

(上接第 23 页)

- [24] Aughterson, Kate.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An anthology of sources and documents[Z]. London: Routledge, 1998.
- [25] 向荣. “茶杯里的风暴”——再论 16 世纪英国的土地问题[J]. 江汉论坛, 1999, (6): 81.

Christian Ethics and the Rising of the Western World

ZHANG Jia-she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rising of the western world is the product of many factors. The paper from social ethics point of view, asserted that the rising of the western world is closely linked with Christian ethics. Christian ethics holds the reasonable kernel for the rising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Christian ethics here mainly includes mutual-help ethics, marriage ethics and economic ethics. The three ensured the society stability in the course of the western's moving toward capitalism, therefore they forcefully support the rising of modern western world.

Key words: Christian ethics; the western world; support role